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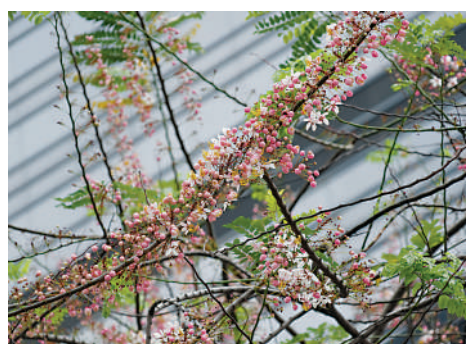
## 節果決明花開

每年春末初夏是節果決明開花時節，位於中環美利酒店旁的節果決明樹最近悄悄綻放，開出一串串淡粉紅、白色交錯的花串，預計五月是盛花期。

美利酒店前身為政府辦公大樓美利大廈，這棵節果決明古樹早於美利大廈建成前已經屹立，至今有百年歷史，於二〇〇四年被列入香港古樹名木冊。

節果決明古樹高達十七米，開花位置較高，除了樹下漫步打卡外，在美利酒店花園樓層或透過酒店的拱廊眺望古樹，亦可捕捉燦爛「花海」。

圖：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市井萬象



## 薪火相傳 回饋社會

——懷念金融界翹楚陳有慶

閱報得悉亞洲金融集團主席、大紫荊勳賢陳有慶先生日前離世。他雖得享九十歲遐齡，但噩耗傳來，仍令眾多友儕感到惋惜。

我認識這位金融界老行尊，是早在二十多年前他當上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的時候。他性格樂觀，待人親切友善，說話直率，與人交談，經常夾着爽朗的笑聲，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他不僅在商界交遊廣闊，也很喜歡和新聞界的朋友打交道。新聞記者自然樂意採訪這樣有問必答的社會名人，因而他的新聞見報率相當高。我至今憶起這位「快樂的銀行家」臉上的笑容仍深有印象。

我記得最後一次找陳有慶進行專訪是在千禧年，那時，他剛主持了香港中華總商會成立一百周年華誕慶典及一系列慶祝活動。整個慶祝活動取得圓滿成功，受到各方好評，意義深遠。作為會長的陳有慶，在大功告成之後，不禁舒了一口氣，懷着歡欣的心情偕同賢內助雙雙到日本和美國旅遊觀光。

重視友情和守諾的陳有慶，難得在外遊那天上午撥冗接受我的專訪。猶記得那天他的心情好靚，神采飛揚，談起連串開心事時，笑哈哈說：「我很幸運，這屆中總會董會輪到我做會長，適逢成立一百周年，可能我的名字取得好，有慶，有慶，好多喜慶，好像上天賜給我一樣……」原來他真是喜事重重，在新一屆的四十二屆董會選舉中，眾望所歸，再度蟬聯會長。而他的兒子陳智思也再度當選議員。還有多年前結婚的陳智思再為人父，太太誕下一個可愛的寧馨兒。難怪陳有慶笑得合不攏嘴了。

說完開心事，陳有慶話語轉

HK人與事  
朱昌文

到當時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他希望中總和香港工商界能抓住這個大好的經濟機遇，加強與內地、台灣和澳門兩岸四地多方面的合作，創出一個前景美好的新局面。

祖籍廣東潮陽縣的陳有慶，一九三二年在汕頭出世。他的父親是泰國金融界巨子陳弼臣。一九四六年，陳有慶到香港讀中學，一九五〇年畢業。「父親說不用上大學，把我帶到泰國去，在他創立的亞洲信託公司工作，從基層工作做起，日間工作，晚上修讀會計、銀行學及商業法，如是者幹了三年，父親把我送到紐約，先後在三家銀行當練習生，也是日間工作晚上讀書，兩年後取得了美國銀行家學院學位。」陳有慶形容那五年白天工作晚上讀書的生涯相當辛苦，但卻學懂了整個銀行的運作，得益很大。

隨後，陳有慶返回香港，父親安排他在其開設的汕頭銀行工作。經過多年經營，增加了保險業務，改名為亞洲金融集團。「整個亞洲金融集團是父親的心血結晶，」陳有慶說，「雖說父親是一個很傳統的商人，但他的投資策略卻一點也不保守，業務獲得穩步發展，由於作風穩健，避過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

值得陳有慶感到特別欣慰的是，他的兩個兒子陳智文和陳智思都很能幹，亞洲金融集團早已由他們接掌打理。陳有慶家族三代事業成功，不忘回饋社會和報效國家。過去多年來，他們三代薪火相傳，不遺餘力屢捐巨資支持內地和香港、泰國等地的各種公益慈善事業，汶川地震、華東水災、希望工程、光彩事業、教育事業等等，到處都看到他們伸出溫暖的手。

## 遙遠的牽掛

北京與多倫多，相距一萬六百公里，乘飛機十三個小時，不可謂不遠，但親人之間的關切，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撼動的。

在多倫多的女兒，牽掛在北京年邁的父母。過去多年，她幾乎每年回北京，陪伴父母。但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她已有兩年多沒有回北京了，心急如焚。

女兒經過周密考慮，決定回北京看望父母。她沒有固定的工作，臨時打工可以請假，在外地隔離三周後，到北京總可以見到父母。但她和母親一說，母親堅決反對，說「在飛機上那麼長時間，難保不染上病毒。」女兒的計劃落了空，和父母仍然不能相見。

現在，輪到母親為女兒牽掛了。其實，媽媽和女兒，幾乎每天微信視頻通話，看到女兒一切如常，母親才放下心來。女兒是姥姥養大的，當年產假只有五十六天，到後期母親不得不離開女兒，回到駐外使館。但母親和女

人生在線  
延靜

兒，畢竟是親骨肉，雖然相距上萬里，但她無時無刻不掛念着女兒。

這次讓母親極度掛念的是女兒的牙齒。女兒的牙很不好，也可能是她跟着姥姥，嬌生慣養，吃糖吃多了。女兒拔牙，已經下了很大決心。不過疫情肆虐，擔心被新冠病毒感染，一再推遲，現在已不能再推遲的情況。醫生為她做了個小手術，才把病牙拔掉，但腮部腫了起來。「這如何見媽媽？」女兒甚為擔心。母親不知情，照例打來視頻電話，一看女兒的模樣，驚愕不已。女兒趕忙解釋了手術情況，安慰母親不要傷心，過幾天就會好。一個星期之後，女兒的臉龐恢復了原來的模樣，也聽到女兒的笑聲，母親才安心下來。

千山萬水，隔不斷人們的親情。母親和女兒的共同願望，不，人們的共同願望是，疫情早日結束，人們可以自由來往相見。

如是我見  
霍無非

早春一日，在魯迅住過的廣州白雲樓一帶兜兜轉轉，與一列老式蒸汽機綠皮火車不期而遇。這是東華南路與大沙頭二馬路的交匯處，周邊高樓幢幢，車水馬龍，火車停在街心花園式的「廣九鐵路紀念園」鐵軌上。「人」字屋頂的亭子間，從右自左書「廣九站」的繁體字，再現了進站口原樣。一百一十年前，廣九站建在近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通過鐵路，連接廣州和香港兩座商貿大埠，無以數計的人客物流，在這一百八十三公里長的鐵路線來往復，連自喻「外江佬」的魯迅也探赜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魯迅給友人章廷謙信提及：「在這月以內，如寄我信，可寄『廣九車站，白雲樓二十六號二樓寓收轉』」，可見它的作用和知名度之大。

既然是主題紀念園，就要有實物陳列，曾在廣九鐵路運行的「建設」6501型機車，和兩節YW22型綠皮車廂充當此任。為方便過路，車頭和車廂是隔開的，行人可由中間穿過。車頭幾乎未栽樹木，停放於路旁上方濃蔭遮蔽，長椅倚間，雕像散落，最引人注目的，是生在廣州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立像，與紀念園的主題非常貼切。

車廂可有當年痕跡？我登車一探究竟，卻未看到遺存舊物，倒是園區四周的若干石碑刻示了廣九鐵路的概況，管中窺豹，對它的運營狀況有了粗略的了解。

先說車次。一九三五年的《簡明行車時刻表》列示：省港間每日對開直通快車兩對，上午八點和下午三點三十分，由廣九站（大沙頭站）各發一列，分別於當日上午十一點五十二分和下午七點二十五分到達九龍站；九龍站上午八點零七分和下午三點也各發一列，到達廣九站分別是當日上午十二點十分和下午六點四十五分，這兩對列車途中均停若干小站。此外，還分別開有廣九站至九龍慢車，廣九站至石龍，石龍至深圳往返客車各一對。

省港近四小時的車程，配有餐車，為乘客提供食品酒水。抗戰時期，餐車

## 邂逅廣九站

的供應中西結合，兼顧中外乘客的飲食習慣。《餐車食品價目表》列酒水、魚、雞、牛、豬、湯等類，其中：三星白蘭地每杯毫洋五毫（角）半，屈臣氏威士忌每杯四毫半，各式小啤酒每樽（瓶）五毫半；炸魚每碟二毫半，吉列大蝦二毫半，炸生蠔二毫半；火腿、番茄雞絲飯每碟三毫半，珍肝飯每碟二毫，粟米燴雞三毫半；洋蔥牛扒每碟二毫半，青豆牛柳每碟三毫，牛肉飯每碟二毫；炸豬排二毫半，又燒飯二毫，火腿白飯三毫；火腿雞絲湯每碟二毫，波蛋湯每碟二毫……價格以毫計，物價比收入不低，對有錢人不算什麼，但非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民百姓所能消費。

廣九鐵路的營運怎樣？早期五年的營收一覽表看出些頭緒：一九一七年收入九十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三元，支出九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二元；一九一八年收入九十萬八千四百一十五元，支出一百零二萬九千零八十三元；一九一九年收入九十五萬六千七百六十一元，支出一百零五萬六千八百三十元；一九二〇年收入一百萬二千四百三十三元，支出九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元；一九二一年收入一百二十八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元，支出九十二萬零七百七十二元。以上收支，未示幣種，大抵也以市面主要流通的毫洋計算。表中後兩年，收入上了台階，支出下降且控制有方，實現了扭虧為盈，所採取的開源節流措施不言而喻。

我年少時與廣九鐵路有緣，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我就讀的廣州市先烈東

路小學就在廣九鐵路旁，每天在火車的隆隆聲中上課、做操，到附近的生產隊菜田勞動。記憶中，每天經過的火車不多，車速亦慢，鐵道穿過校外通向外語學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前身）的路口，火車快到時，守道工把長長的木杆放下，禁止人車前行，火車駛離後，木杆拉起放行。學校不遠有座鐵路橋，橋下小河潺潺。有一次，我們幾個小夥伴到這裏玩，其中一人的小弟獨自上了橋，我也跟上去，過一會火車遠遠駛來，人們着聲地呼喊，嚇着了小弟，站在橋上發呆。橋旁沒有避火車的護欄通道，容不得多想，我跑去拉抱小弟離開，力氣不夠，沒幾步就把他摔了。危急時趕來一位小伙子，抱起小弟跑到橋頭，和我跳下軌道，這時火車也開到跟前停下，我們被好好「教育」了一番。

那時，廣九站已更名廣州站，發往九龍和北京方向的火車有一程同軌，在沙河頂橋下分岔。一九七〇年，我家北遷中原，乘火車打這兒路過。一九七四年，我回廣州探親，終點是環市西路的新廣州站，場面宏闊，壯觀氣派。十年後，老站拆除，逐步開發成商業樓盤。沙河頂橋下雙線同軌的老鐵路，也改為雙向六車道的內環路。二十多年前，新廣州東站在沙河落成啟用，車次主要發往深圳、九龍，真是日新月異啊。

運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廣九站，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它見證了新中國鐵路建設的飛速發展，像紐帶連起同根同宗的省港兩地，送去祖國對香港同胞的關懷。



廣州「廣九鐵路紀念園」內陳列着「建設」6501型機車和綠皮車廂。  
作者攝

## 《中國最後一代文人》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中國最後一代文人》是榮鴻曾教授的一本傳記著作，書的主人翁是蔡德允女史，一位來自上海書香世代的文人。中國文人並非一個職業，而是一種身份的象徵，這個身份裏面包含着學養、修養、做事處世的態度和談吐的方法。

文人是士大夫文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這也是中國文化價值的核心之一。然而文人傳統在百多年前已消失。這本傳記十分重要，它記錄了蔡德允女史的一生、她的學習經歷以及為人處事的方式。當然也少不了與古琴的故事。

書中將古琴分為「文人琴」和「藝人琴」，蔡德允女史屬於前者，不是用來娛

樂大家，而是用作自我修為的一個過程。古人彈古琴，是自得其樂，是自我享受，也是一種修養修煉。像練太極，本身的對象是自己，是自己修煉修為的一個過程。學古琴、練古琴、習古琴亦然，並非為了炫技。「藝人琴」的定位則不同，其主要目的是娛樂大眾，有觀眾、有對象，因此他們演奏樂曲的模式以及演奏的手法，和「文人琴」截然不同。

蔡德允老師桃李滿門，學生來自四方八面不同職業的人，有醫生、律師、藝術教授、藝術家，也有學者。她收徒不是那種收費式的學習過程，更重視拜師學藝的精神。

《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英文原著最近翻譯成中文，由三聯書店（香港）出版。裏面介紹了蔡老師一生的經歷、她和學生互動的過程，以及她對古琴的看法。若想

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一個別樣的了解，這本書非常重要。當時的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平穩安定的社會，為中國傳統文人提供了一片小天地。如今，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需要了解香港從來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小天地。

隨着香港經濟發展，社會漸漸過度強調經濟效益，在經濟壓力之下，「文人琴」可以說是難以繼續存在。從做琴師開始，到學習古琴，很多時候就變成了一種交易和投資，而不是個人的修為。

香港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而不是只有西方文化。如果主流是一些西方粗俗文化，那麼東方和西方的精緻文化很難在香港落地生根。也難以打造香港特色，也可能會削弱影響力。這一方面，亞洲其他地區較領先。